

彝剧以全新面貌走向更大舞台

何煜

作为地方民族戏剧，彝剧虽不及京剧那般享誉世界，但它植根于多姿多彩的彝族文化，凭借明快自然、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现实观照，俘获了一批又一批观众的心。欣赏《大王操兵》《半夜羊叫》《花开的声音》等作品，我们会发现时尚前卫与接地气的彝剧“松毛气”“羊膻味”能够交相辉映。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彝剧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走向更大的舞台。

一、原汁原味 塑造经典

《大王操兵》是一部流传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彝族山村的一个古老剧目，主要讲述了山大王（村寨首领）召集民丁进行操练，指挥他们舞刀，舞三节棒，舞霸王鞭……最后全寨人民都参与其中，尽情歌舞，喝酒吃肉的故事。整部作品融彝、汉歌舞艺术为一炉，集古今男女于一台，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古代山区彝族人民生产劳动、共同守护村寨的生活情景。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红？”当京剧《卖水》中西皮流水段一出，人们头脑里自然而然就能浮现出梅英娇俏可爱，明艳动人的形象；“张昭献计，妙非常”，半说半唱，以三国故事为主，毋庸置疑是刘派京韵大鼓名段。彝剧同样如此，如果将《大王操兵》比作美食，毫无疑问这是一锅鲜香的“羊汤”，服装、唱词、曲调就是烹调这锅美味不可或缺的资料。从着装来看，大王身穿羊皮，外罩黑蟒；蛮头（大王的卫士）外套羊皮，身背弓弩，演员一登场，即使不开口，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羊膻味”；从唱词来看，“吃羊肉”“啃羊骨”“熬羊油”多番出现，将彝族日常生活风俗搬上舞台，散发着亲切淳朴的彝家原生态

自然之美；从曲调来看，彝族调与花灯调相辅相成，风趣生动，“跳笙跳到太阳出，一碗稀饭两片肉。一碗稀饭吃完了，只见稀饭不见肉”，当剧中歌手用地道纯正的彝语边跳边唱时，仿佛能闻到飘香四溢的农家饭菜，带领观众走进草青叶绿，羊群遍地的彝寨。

以口夸村花灯老艺人李如高、杨正开曾提到《大王操兵》中的大王，其实就是孟获，戏里称他为孟大王，在诸葛亮南征传说的影响下，这种祭祀仪式被继承了下来，因此每到正月初八祭土主之日时，村里都要请孟大王来“镇寨”。由此可见《大王操兵》中的舞蹈展演，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一种严肃的“祭神仪式”，不论是兵丁们开展舞刀、舞枪、对打、群打表演，还是众人齐跳锣鼓，其目的都是取悦神灵，祭崇山川土地之神，彰显林人共生、万物有灵的观念与信仰。而山大王与村里男女老少共尝太平果，同饮“四季太平”酒，则淋漓尽致地凸显出与民同乐，豪迈大气的人文情怀，如同身临其境，感受欢庆山寨太平无事，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热闹场面。

彝剧最早的移植可以追溯到《大王操兵》，在流传的过程中虽然汲取了花灯元素，但依旧风味纯正。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经典剧目不但备受彝族同胞的喜爱，而且也广泛流传于汉族地区，在彝、汉艺术文化交流、融洽民族间关系上，始终发挥着促进作用。

二、关注现实 讴歌时代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戏剧作为民族文化艺术产品，十分强调现实性，其本质就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1958年，《半夜羊叫》被文化部正式命名为彝剧

的代表性剧目，全剧取材于稀松平常的彝家生活，以“羊”为线索，展现了力立颇在党的教育下，从不信任农业合作社到知错能改，主动回归集体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彝剧紧跟时代步伐，讴歌现实的创作品质。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宋玉设譬取喻，精彩辩白，从当下来看，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虽各有侧重，但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相较于西方古典音乐的晦涩难懂，彝剧《半夜羊叫》则十分亲民接地气，是一部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窥探人物形象，可发现主人公力立颇与电影《安家》中的李有光比较相似，一开始，面对罗顺带领全村人民进行的农业合作化改革，他始终处于质疑犹豫状态，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不惜在夜深人静时和妻子一起将集体羊杀掉后做成羊干巴，由于内疚和惭愧引发了一系列笑剧，最终在大家的感召下，及时改正错误，加入到合作化后的第一个火把节中。品析艺术效果，从剧名到内容，都没有离开一个“羊”字，赶羊群、腌羊肉、烧羊骨等贯穿始终，更重要的是在本剧上演初期，均以彝语彝腔进行唱白，民族气息充盈。艺术性是艺术作品的基要求，艺术功能的发挥需要作品自觉地进行艺术性处理，虽然这一时期的彝剧已经具备了独立的艺术形式，也取得了较为良好的反响，但在舞台演绎、剧本语言、服装布景等多方面依旧还需要精雕细琢。

由观之，20世纪50年代的彝剧虽然同样形式中规中矩，但与《大王操兵》时期相比，本阶段的创作逐步回归到现实，神化色彩明显减弱，把重点放在了政策制度的普及和宣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国家的宣传阵地。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经济服务，旨在通

过通俗易懂的戏剧作品，记录时代进步过程，解答少数民族同胞对新政策的疑惑和不解之处，发挥彝剧的教育教化功能。

三、焕然一新 光照岁月

时光荏苒，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彝剧事业再次迎来春天，昂首阔步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彝剧工作者们博采众长，在汲取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之后，推陈出新，用一部部优秀作品惊艳着时光。2022年，李根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小舞剧《花开的声音》，依靠轻松隽永的剧情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仅成功走上云南省新年戏曲晚会的舞台，而且参与了 CCTV-15 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我的家乡我的年》的节目录制，成为了新时代展示楚雄地域风情的一张文化名片。

艺术服务于社会，艺术的思想性是艺术作品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艺术作品的灵魂。《花》剧的创作，首先体现在思想内涵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剧主旨清晰明了，富有层次，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极具现实意义，善于运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塑造了彝族村落的两位平民英雄——阿强、阿芝，着力表现乡村振兴过程中致富带头人对父老乡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共同富裕的无限追求。与此同时，融入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与以往所见的彝剧大相径庭，不再是诸如《大王操兵》那般侧重刻画男性高、大、全的形象，要么忽略女性形象建构，要么将女性塑造为男性的附属品，而是充分彰显出了对优秀女性的歌颂，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

其次，注重创新戏剧视觉审美效果，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提出“移步

不换形”的主张，认为传承与创新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建立在新的审美取向上的扬弃。从这一点来看，彝舞、彝寨环境等凸显了《花》剧的民族性，但在表演上并没有局限于本民族艺术，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注入了西方戏剧的艺术精髓。《小城风光》被誉为了一幅20世纪早期美国乡村生活的风情画，这正是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借鉴融合中国戏剧之后的代表作，他认为过于臃肿的舞台背景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把戏剧本身淹没在华丽的道具之中，因此借鉴了东方戏剧弱化和虚化的特点，形成了不落窠臼的极简风格和舞台监督。舞剧《花开的声音》同样参考了源自英国的“浸没式戏剧”，凭借深刻的剧情内涵，开放式的舞台和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给观众带去了一场舞美、歌美、人更美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并在审美情趣上有了质的飞跃，美感和观赏性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王晓鹰曾提到中国原创戏剧的总体性美学目标应是“诗化现实主义”，《花》剧不同于《阿龙与莉诺》这种射线式大型舞剧，它直接将戏核呈现出来，没有浮华堆砌和虚假煽情，回归到“人”本身，热衷于在对人性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追求戏剧的诗意品格，增强诗化色彩，从而走向现代和国际舞台。

迄今为止，彝剧已走过60余载的发展历程，用三次高潮积极回应着不同时代对民族民间戏剧的召唤。从具有浓厚彝特色彩的经典剧目《大王操兵》，到紧扣现实生活，歌颂农业合作社的《半夜羊叫》，再到异彩纷呈，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花开的声音》，彝剧始终以虚怀若谷的姿态突破自我，追求卓越。既重视题材的丰富性，涉及神话、历史、现实等多个方面，又不忽略大、小舞剧的平衡性，凭借自我革命精神，破茧成蝶，在云南15种濒危少数民族戏剧中绽放光芒，熠熠生辉。

感受唐诗穿越时空的魅力——《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介绍

陈璨



自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陈铁民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一直专注于全唐诗的注释增订工作，他们以对诗歌文化的一腔赤诚，花费30年时间编著而成一部文学巨著——《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

唐诗这一诗歌题材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记录了唐代文人儒客的伟大智慧，它以璀璨的模样屹立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在纸页间觅诗吟诵，那些炽热的情怀，无数次润湿我们的眼眶，陈铁民、彭庆生教授与全国180多位唐诗研究学者共同协作，历时10年，完成了16开5大册的《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少新的唐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12年，唐诗研究学者白维国提出应对《增订注释全唐诗》进行修订，于是，陈铁民、彭庆生又带着对唐诗文化的敬畏之心，花费10年时间，对原《增订注释全唐诗》进行了修订，吸收更多新的研究成果。《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规划出版之初，入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并于2014年入选增补为安徽省“十二五”规划项目。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黄山书社2023年2月版）全书仍为5册，有1800余万字，新修本以唐代2000多位作者的小传和诗歌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对原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唐诗研究新成果，是目前《全唐诗》的权威全注本。它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唐诗研究的发展，对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具有重大的基础性建设意义。

十余年来，陈铁民、彭庆生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倾注在修订增订注释全唐诗的工作中。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陈铁民，在毕业后的十余年里始终扎根在古典文献研究的第一线，古籍整理对于他而言，是毕生追随的信仰，他曾说：“我愿为学术而奋斗，更希望看到古籍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相比《增订注释全唐诗》，《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更加严谨，更具权威性，它不仅是一部详备的唐代诗歌总集，还比照前版，对包括典故、词语、脱意前人的语句、典章制度、史实、人名、地名等内容进行了讹误的认真修正。同时，对内容的缺漏进行了详细的补充说明，在修编文本上颇注重内容与史实的一致性，讲究语句通畅洗练，力求使修编本的内容质量达于上乘。

从《增订注释全唐诗》到《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是学界对唐诗理解深度的一次提升，他们从1992年开始，花费将近30年时间，将一部《全唐诗》进行了反复整理、注释，修订的过程中修剪枝叶，付诸时间与耐心，删删减减的同时，又培植出一束束新的枝叶，使其呈现出更为雅观、精良的一面。研究古籍是一个修练的过程，既要忠于史实，又要具有创新精神，在漫漫岁月里，不断研磨古籍文化的精深要义，才能咂摸出这一文化所诠释的甘甜味。《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的出版，不仅为学界唐诗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全注本，也极大推动了唐诗的普及、传承与发展。

滇越铁路发展史的形象构建——读《孤鸿》

布小继

《孤鸿》（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系老铁路人、建水籍作家王福永“滇越铁路三部曲”（长篇小说）之二，是《烟变》的姊妹篇，全书以主人公王诚如在米轨铁路阿迷分局及昆明分局的遭遇为主线，深情地叙写了主人公由蒙自电务段和阿迷分局党校、党校的优秀干部到改制转轨后的遭受波折再到多年后看淡世情、转向编撰和研究的系列际遇，串联起了30年左右的滇越米轨铁路和铁路的发展历程与奋斗史，可谓是滇越铁路史的形象构建之作。

众所周知，为某人、某事或某物作史，既需要相关的历史事实、历史细节，也需要相关的历史回忆、历史胆识，当然，更好的作品还需要深刻的历史洞见及隐藏其中的历史发展趋势预测。

从滇越铁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条让国人爱恨交织的云南乃至西部地区第一条铁路，既被认为是云南和清政府的耻辱——是中法战争后丧权辱国条约的产物，也是不平等或近乎掠夺式贸易的产物——借助该大通道，云南的锡、磷等诸多矿产与地方特产被低价购走，众多县乡又变成了西方国家工业品的倾销地。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云南的现代化，帮助云南人走向大海和国外——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抗战时期的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机关到云南，也不会有现今引以为傲的西南联大。抗战期间，也同样遭遇了被日本飞机轰炸和自然坍塌而至运量逐年减少、损毁铁轨的命运。抗战前期居功至伟，后期却无法再发挥其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风云波谲云诡，而这条铁路也命运多舛，直到近年来才迎来了新的生机。

小说主人公对铁路的情感已经成为了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包括阿迷分局政工干部部卿明、佟文利、马公安、栗莉、赵向南、张山明、盘溪、蒙自电务段的李文安、苏磊和迷哈地车站的杨民海，还是干部家属小黄等，都对铁路充满了感情，他们作为铁路人自我地做好本职工作，主动把命运和铁路联系在一起；在铁路改革开放、撤转并销的趋势面前，没有机械地被动应付，而是极力适应、放平姿态，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服从领导、服从指挥，发扬了“铁道兵”（铁道兵）的精神。

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作家编织出了一部亲历者的个人史和集体史。作为对抗遗忘和压力的铁路书写，《孤鸿》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努力记录下了昆明局开远分局（阿迷分局）下辖的滇越铁路几十年内的历史。作为一条百年铁路，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不可避免，但最害怕的是遗忘，当它不被需要之时，也许就是死亡之日。作家借助为其立传、写史的方式，来努力留下一些痕迹。又提醒后来者，作为云南铁路乃

至全国铁路的“祖先”，在当下申遗的关口，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它的文化，挖掘出它的价值，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孤鸿》为平凡的滇越铁路人立传。主人公王诚如及其周围的工人，作为改革的亲历者，无论承受了怎样的苦痛、遭受了何等的不公，都不是消极守候和等待，而是积极努力、想办法，帮助铁路分局和工人群众走出困境。他们在工作中的情谊，显然也是作家最为看重的。即便到了省城生活，依然不忘初心、不忘当年的情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正义、友谊和共同目标来努力。所以，到水塘车站看望王诚如（尽管王闭门不见），到鸡街把29号机车头运到铁路博物馆展览，以及多种经营（打开围墙做生意），都有着深深的历史印迹。

“孤鸿”之“孤”在于作家塑造了为数不多、难有应和的先行者形象。譬如局党委书记郝卿明、譬如王诚如，其做事基于民众立场，做人讲原则党性又豪爽仗义，在职时容易得到肯定和推崇。一旦失势或不在其位，就容易遭到别人诬告、陷害、攻讦、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由于步子迈得快、改革力度大，也就难免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孤”就注定是这些不容易被理解甚至成为被打击对象的先行者所要承受的代价。作为个人史，他她确实可能存在于任何触及利益的改革环境与场合中。

郁达夫在《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孤鸿》一书，就弥漫着作者个人的强烈味道。这是指作家在主人公身上用力甚大、用情极深，甚至可以说，主人公就是作家的化身。他天资聪明、好学肯思、对米轨铁路有特殊的情感，又点诸多、重义气、好交往，既有人缘、懂人情世故，是同事朋友亲戚的军师，又有能干、敢闯敢想敢为的一面，被赋予了路政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的角色。他的每一次职务变迁，都与机构改革、调整或肩负重任相关。而到了最高点（即小说中阿迷分局撤并后的副处长），就让他因为贪污5500元（或为分配不均所致）的公款及莫须有的“滇越会”而被“分配”到水塘车站，闭门苦读、钻研滇越铁路的历史，从此走上滇越铁路史研究之路。

这一自叙传式写法的意义在于：创造出了一个可以自足自励的空间。自叙传在叙述过程中的视点就是把作家自我作为叙述者与故事主人公二为一，故以一种限制叙述的方式逐一呈现，在把经历、个性和身份代入之时，也可以从情感的张弛上进行适度取舍，既不容易泛滥成灾，也有助于叙述流畅性的保持。以叙述者对故事的掌控，来不断推进故事往纵深发展。人生经历决定了作家对系列事件的表现深度。以此来看，他们无疑构成一个可

以自足和自励的空间而具有了自我言说和指涉的意味。创造出了一个在叙述上相对聚焦的点-线-面。众所周知，长篇作品是极为关注结构的，结构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部长篇能否成为好的长篇。《孤鸿》利用自叙传的叙述体式，以为每节命名的方式，整合了故事，沿着主人公的轨迹，从蒙自迷哈地车站、蒙自电务段到分局党校、分局党委办再到昆明局及其管内的水塘车站、博物馆，既帮助领略了各地的风景民俗，也书写了人们的悲欢离合、明争暗斗，这些曲折波澜和事件组织起来，就构成了作品由主线（王诚如的活动轨迹）与支线（其他人的活动轨迹）交织的行动网络，以事写人、以人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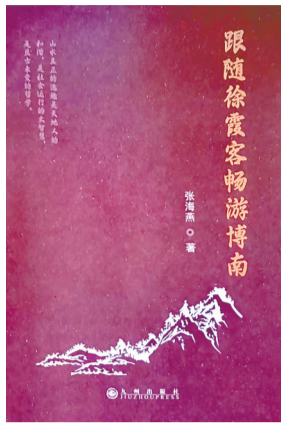
自叙传式写法能够呈现出足够丰富的点，使整个故事叙述更为生动。由于外聚象叙述的缘故，叙述者并不能确切感知到同一时间点（时点）所有发生的故事，需要借助多种的感知方式，如告知（赵向南被打、路局调整、个人职务调整和被陷害等），转述（小黄、马公安、李文林等人的转述）以及他叙等，但主体还是以王诚如为叙述圆心，随着他的升降起伏，故事呈现出了相对应的的发展趋势而变得丰富。

鲁迅在谈到文学批评时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诚哉斯言。完成长篇作品犹如建盖高楼大厦，“三部曲”或多部曲类的长篇作品（及非虚构）尤其如此。《孤鸿》一书也有诸多不足，首先，人性世相的书写不足。小说应以能够写出人性深处幽微暗昧的一面为最佳，不仅是表现人心中所想而人人笔下所无，更是要从人性的深层次需要上去勇敢捕捉。这样，小说才会有感人至深或者读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人物的刻画与故事叙述之间的衔接并不流畅，对话和叙述的提炼不足、回味不够，而过程性的交代：如对《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中十个要点的照章摘录及之后的对话，就显得平淡有余而缺少波澜。

其次，人物刻画的深度不够。如果说主人公王诚如还能够稍微给读者留下一些印象外，其他人几乎都较为模糊——或者单一性格而不够立体，或者是琢磨不透、刻画不够而面目不清，或者是不够少个性性格发展的书写手段而不够丰满。太过于熟悉而缺少适当的“隔”致使艺术化的塑造不足。此外，艺术追求离原初设计有距离。该书离“爱党爱国的生动教材，铁路常识的艺术演绎，铁路工人的人文情怀，滇越铁路迷们的精神家园”（《孤鸿》封面语）的艺术追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包括作品语言上的吸引力不够，未把铁路常识的普及介绍与语言的生动性紧密结合起来，对读者的需要理解不够、关照不足等等。

霞客履迹谱新篇

黄正良 宋炳龙



大理永平作者张海燕的著作《跟随徐霞客畅游博南》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2022年12月版），书中再现了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笔下在永平的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该书由永平的博南山为核心放射出去，布局合理，收放有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文笔流畅，是一部研究《徐霞客游记》的成功力作。

《跟随徐霞客畅游博南》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置哀牢、博南二县”展开，简述了距今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博南古道是“蜀身毒道”的咽喉要道。它是由四川通往缅甸、印度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虽然滇缅公路的开通，博南古道被边缘化了，但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却浓缩在这条古道上。多少骚人墨客在博南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诗词、文章，记述了古道上的风雨沧桑，最典型的就是明朝的杨升庵与徐霞客。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深入游历、较为完整描述永平自然山水、人文地理的人，而《徐霞客游记》中记述永平的篇章是最真实的史料，是永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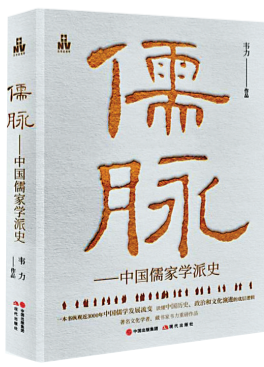
《跟随徐霞客畅游博南》所记以徐霞客永平之行为主线，应用文献学、考古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法将重走所见所闻所感呈现给读者。第一部分，以五岳之志与万里霞征、纳于大麓、云南的灵性残霞、游圣的仆人四个篇章概括介绍徐霞客简历及其作品情况。第二部分，作者以徐霞客永平之旅为主线，迤西咽喉博南山、彩虹桥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以考证的方式彰显了永平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永平优美的风光和人文景观。第三部分对《徐霞客游记》有关永平的记载进行原文转载和译文，以方便读者阅读。

该书雅俗共赏，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之人的最大愿望。从作者重走徐霞客在永平的足迹，看到了一种活态的博南文化，它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博南历史和文化，而是将作者自己所见所闻，用鲜活的语言，灵活多变的论证和描述，妙趣横生地呈现给读者。作者重走徐霞客永平路线，并不是走马观花地简单重复，而是用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每一个站点进行深入调查，认真思考和求证，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另外，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家乡的挚爱。永平地广人稀，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要完成徐霞客走过的路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一个女子来说就更不容易。但目标既定，作者就用心走完了霞客走过的博南之路。

《跟随徐霞客畅游博南》一书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因为她的行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做到了推究事物的道理，尊重科学规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书写了徐霞客履迹的瑰丽篇章。

《儒脉》出版



《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日前由现代出版社出版（韦力著，2023年5月版）。该书从梳理儒学派发展脉络切入，详细解读了近3000年中国儒学发展流变的历史。全书以时代为经，以儒家各学派重要人物为纬，讲述了儒家的起源、流派、儒学发展各阶段儒家的核心概念以及儒学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嬗变。

《儒脉》的作者韦力系国际儒联出版宣传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目录版本学、藏书史、中国传统文史等，著有《觅圣记》《觅文记》《觅诗记》《书楼寻踪》《鲁迅藏书志》《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芷兰斋书跋》《古书之爱》等30余部专著。郑千山